

G40-0927/11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

崔国良 编

2176  
09



21535460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3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崔国良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叶立群,吴履平主编)

ISBN 7-107-12032-8

I. 张… II. 崔… III. 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455 号

---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

崔国良 编

责任编辑 邱瑾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9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4 字数 337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平装本 ISBN 7-107-12032-8/G·5142 定价 18.00 元  
精装本 ISBN 7-107-12033-6/G·5143 定价 26.70 元

本书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资助出版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 总主编：叶立群 吴履平
- 副总主编：吕 达 田正平 邱 瑾

#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

## 总 序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是《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的继续，选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要教育论著。这套丛书业已列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目的在于：力图系统完整地搜集、整理、保存我国近代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文献，以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教育思潮，以及不同流派的教育观点。

这套丛书注重选辑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论著，以反映当时的教育学术水平、教育思潮的趋势，以及教育流派的论争。选辑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实验或调查报告，以及专著节录等。除尽量搜集已经公开发表的教育论著外，并大力访求未公开发表的遗文和手稿。有的教育家，虽已出版过选集或文集，亦重新选辑纳入丛书，以体现新的特色。

这套丛书按教育家立卷。各卷实行主编负责制。一般情况，一册即为一卷，但篇幅多者可以一卷分为几册；篇幅少者可以几卷合为一册。各卷由主编或特约专家撰写一篇前言，简要评述该教育家的教育事迹、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和影响。各卷卷首

载有该卷作者的照片、手迹等，卷末附录该卷作者教育论文、专著、译文、译著的年表或目录。对于有些作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可酌收几篇，列为附录。读者一卷在手，便可纵览全貌。

这套丛书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倡议的，他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多次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一直鼎力支持。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主编和编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原丛书总主编陈学恂教授为这套丛书总体计划的拟订和前期编审工作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我们对此深表敬意。由于陈学恂先生谢世，高航同志工作变动，本丛书编审委员会作了相应调整，由下列人员组成（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立群、田正平、吕达、吴履平、邱瑾、邵祖德，以叶立群（中国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会理事长）、吴履平（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总编辑）为总主编，吕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田正平（杭州大学教授）、邱瑾（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为副总主编。

限于水平，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还存在不妥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编审委员会

1994年1月

## 本卷前言

**张伯苓** (1876—1951), 名寿春, 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他用毕生的精力创办了南开学校教育体系, 为我国近代教育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1891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 1894年学毕课业, 在实习期间他身经甲午战败, 目睹将威海卫拱手由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转给英帝国主义之手的奇耻大辱, 认识到海军挽救不了亡国之命, 遂弃武从教, 决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8年从严修家馆起讲授西学。1901年又兼授天津绅商王奎章家馆。1903年暑假, 他有感于日本强国瑞赖教育, 在赴日参观博览会时, 便中考察教育。1904年偕严修专程赴日考察教育三个月, 回津后立即在严修偏院成立中学, 名为“私立中学堂”, 旋改名“敬业中学堂”, 翌年4月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在天津“南开洼”建成新校舍, 迁校后改名“南开中学堂”。

1908年秋, 赴美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并考察欧美教育。1909年7月他在天津仓门口教堂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12年7月出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 任副会长。1916年严氏女中开班, 兼任校长。

1917年3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 研究教育。翌年迎接严修、范静生等抵纽约, 共同切磋教育问题。1918年底回国后开始筹办大学,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11月, 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张伯苓在中国教育方面的成绩授予他该

校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1920年起先后参加并筹组新教育共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并在此基础上筹组中华教育改进社，被选为董事兼司库。

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新校址。同年创办南开女中；1927年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1934年改为经济研究所；1928年成立南开小学，试验设计教学法；1932年又创建了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这时南开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从小学到研究所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1927年张伯苓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吞食我国东北的野心，乃组织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亲自并组织师生赴东北调查，编写了《东北经济地理》，作为中学一门课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29年又赴美进行募款活动，并赴英、法、意、瑞士、德、奥、丹麦、挪威等国考察教育同社会的关系。

1931年赴沈阳，应张学良聘，参加东北大学校务会议，协助其管理校务。

1936年日寇逼近华北，他决定在重庆建立南渝中学。1937年7月，日寇炸毁了天津南开系列各校。张伯苓表示“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未能毁者，南开之精神。”蒋介石当即允诺：“有中国必有南开”。8月，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先迁至长沙，不久，又迁往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为三常委之一。中学和研究所先后迁至重庆。南渝中学于1938年改名为南开中学。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张伯苓为副议长。此时张伯苓对蒋介石由迷信转为吹捧，受到时人批评。抗战期间，张伯苓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抗战胜利后，1945年和1946年南开中学和大学先后复员

天津。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1946年张伯苓赴美就医，同年和翌年先后获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学位。

1948年6月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此时他已经陷入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不久，由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于11月离任赴重庆准备迎接解放。重庆解放后，于1950年到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同年9月回到天津，受到故旧及学生的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在半个世纪的教育活动中，创出了南开（逢“难”必开）精神。建立了闻名中外的南开教育体系。在创建过程中，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目标、方针和方法，总结并形成了他的“公能教育思想”，并把它定为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其“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他的公能教育思想的实质，在于培养人的素质，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

一、重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他主张教育应随社会需要而变化。张伯苓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向西方学习的教育家之一。他几经反复、比较后指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国情而定”，“教育方法可随时改变而宗旨不变。”中国教育应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教育着重个人的长进，更须着重社会的进步”。这些思想，在本世纪初期，在“全盘西化”的风气盛行时，是颇有见地的，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世纪初，他针对中国愚、弱、贫、散、私的国民状况，希图通过教育，为中华民族培育“新人种（种族）”，为社会培训“新国民”，为国家培养救国的各种“领袖人才”，以御外侮，并



“使我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殆至民国建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觉我国人民要富强，必须进一步改革教育，改掉数千年来“重士轻工之观念，致养成一般空谈而不做事之腐败阶级”的弊端。自1917年起，即分文、理、商三科，实现“以文治国，以理强国，以商富国”的培养干才的目标。南开培养出了为振兴中华而享誉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周恩来、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和戏剧家曹禺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与张伯苓上述办学宗旨分不开的。

二、教育要使学生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而“德育为万事之本”。他的“允公”思想，“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他屏除了道德仅是个人修身的思想，而把“爱国爱群之公德”做为衡量道德的标准。他说：“人格与人合作才能表现。”“凡于社会有效劳能力者，Social efficiency 则有道德”，“凡人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因此，他在德育方面，特别注重为公、爱国主义、诚实的人格、团结合作的团体精神等内容的教育。南开德育课向不用书本做教材，他创造了“修身班”的形式（20年代后改为“学生集会”，每周三集合学生，由校长及老师或请名人学者讲演），他们多以亲身经历、国耻事业、国内外时事进行教育。如1905年在《敬告天津学界同志诸君》一文中，就提出用“抵制美货”的事件做为“修身科材料晓喻生徒，俾得传知各亲族戚友，以冀遍及。”并将讲演录在《校风》《南开周刊》《南开大学周刊》上发表，使南开校友也能得到教诲。这熏陶了南开几代人。他还寓教育于戏剧、出版、社团、体育和社会调查等各项活动中。

三、张伯苓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是使学生“学行合一”、“手脑并用”。他的“允能”思想，即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

能力。他在本世纪初，就重视“科学教育”。他认为“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主张“科学精神，不重玄想重观察，不重讲解重实验”。1904年，他就从日本购得大批理化仪器和标本，这在当时的中学是少有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Dr. Elliot）参观后深为赞许。

张伯苓还非常重视课外活动。他说：“到学校来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学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所以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他亲自组织学生一起编演话剧，组织新剧团。他是直接将欧美现代戏剧引入我国北方的第一人，并使南开话剧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结束了它的萌芽期”，“标志我国新兴话剧的一个新阶段的开端。”（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他支持学生办报刊（20年代南开中学同时就有学生办的校刊《校风》、会刊《敬业》、《励学》、《青年》、《英文季刊》等多种报刊）；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学术团体如数学研究会、科学研究会、天津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等，学生团体如敬业乐群会、自治励学会、青年会等，文化团体如讲演会、音乐研究会等）及各种体育组织，等等，让学生在各种组织中，增长才干，锻炼组织和实际工作能力。

他还强调学生亲自接触自然、认识社会。让学生“以大自然为教室，以社会为教材，利用活的材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之眼界。”从本世纪初起，即组织学生进行野游旅行，到乡间、工厂、企业、机关、报社、学校、监狱、军队等广泛接触自然和社会，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和国情，并把它定为“社会视察和调查”正式课程。每月进行一次。初中重在观察自然；高中重在视察社会制度和状况；大学重在调查社会情状和问题。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以增加学生的真实知

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倡导近代体育运动。他身历“国帜三易”时，见到英军高大强健的体魄和清兵羸弱瘦矮的身躯后，立志培育中华新种族。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认为“我国人最缺者为体育”，所以，他说：“教育里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还在建校初时，他就用鸡毛掸子架在桌凳间教学生跳高。

他重视运动队的培养，更注重体育运动的普及。他说：“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所以，南开学校的运动设备和场地也是全国同类校中首屈一指的。

他还注意体德的培育。他指出：“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他认为体育可以培养团体组织意识，合作品质和竞争精神。他还重视学生生理卫生教育。他主张“不懂得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

他在我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是我国首届全国运动会的，也是全国体育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历任中华业余体育总会会长；主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建立，并为董事长、会长、理事长；他还是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多届远东运动会的总裁判和中国总领队。

五、张伯苓还创造了一整套南开高效能的管理经验。他特别注重聘任著名学者（包括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学者）到校任教。他所聘任的如姜立夫、饶毓泰、杨石先等成为我国相应学科的创始人或带头人。早在20年代，他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学方针，并组织董事会，依靠社会力量管理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注意选贤任能，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加上他倡导的节俭务实的办

事作风，都使他能对南开系列学校实施高效率的管理。南开学校堪称我国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范例。

\*            \*            \*            \*            \*

张仲述（1892—1957），名彭春，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戏剧家。他协助其兄张伯苓从事南开中学的建设和创建南开大学。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6年8月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他目睹了欧美各国飞速发展的状况，认为“当今20世纪纯然一学术竞争之世界，而非有心无力者之所能为也。”因此，他立即提议将专门部改办大学。这一提议将创办南开大学提到日程上。他提出“南开大学生，纵不能发明新理为世界学问之先导，亦决不令膛乎欧美开流之大后，而必与之并驾齐驱”，并提出了改办南开大学计划。因而导至翌年，张伯苓继而严范孙、范静生等赴美进修并考察大学教育，以为创建大学之准备。

1917年8月—1918年12月，张彭春任南开学校代理校长。他在教学方面多有改革，如实行军国民教育，将全校学生团体合组为“学生组织联合会”，将多种学生刊物合为《南开思潮》，以锻炼学生的团体精神和自治能力。

1919年协助严范孙、张伯苓筹划南开大学，任筹备课主任，主持制订了《南开大学计划书》，成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张伯苓语）。

1919年他再次赴美。1922年以《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南开任南开大学教授并兼中华教育改进社研究员。

1923年他主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北京师大合办的“中学课程研究班”。同年他受聘清华学校任教务长。从此，清华大学进入了创办时期。他主持起草了《清华大学的总纲》，并制订了

过渡方案：一是将清华“学校与游学完全划分，停招旧制之留美预备班。二是建立新校，完全在本国造成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三是游美学额之给予，完全公之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以公开考试定之。”这三项政策“是清华学校最切中时代需要之改革。”（陶行知语）在他的提议下清华设立了研究院，从而确定了清华大学实行普通科、专门科及研究院的教学体制的格局。

1926年秋，张彭春复任南开大学教授，兼中学部工作。1927年暑期他实际主持了南开中学“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会上他做了主报告，提出了“开辟的经验”，提出“学校工作当以动作为主，学科为副”的“开辟的经验”的教学三动作。这个理论使南开中学的教学更加发挥学生的自动精神和培养创造能力。1928年任南开中学部主任。

1932年他在《教育工作的一个新方向》一文中，批判了封建的“士”的教育观，提出了“力心同劳”，开办了“新教育试验班”，并开设了木工、铁工和印刷三个工厂，试行半工半读教育。这对破除封建教育思想是有积极意义和革新精神的。

1916年起，他担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兼导演。1918年由他主稿创作并导演的《新村正》，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新兴话剧一个新阶段的开端。”在此前后他还指导编译名剧多种，培养了曹禺等一批中外知名的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

由于抗战爆发，中断了他的教育和戏剧的事业，走上了外交道路，1940年起，他先后担任驻土耳其和智利特命全权公使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1951年他宣布与台湾脱离关系，长期客居美国，1957年病逝。

## 编者的话

一、本书收入了张伯苓自1904年至1948年的讲演、论文、书信、报告、序文、题词等近140篇，并将其1951年的《遗嘱》收入做为附录一；将其胞弟张彭春在南开期间所写的有关教育论著共20余篇收入做为附录二，以便全面反映他们伯仲二人在南开学校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二、选文一般按写作或讲演时间顺序排列，写作或讲演时间不详的，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讲演时间除原文标明者外，个别不详的由编者根据有关资料推定。

三、所选文章尽量依原有标题。原文没有标题或标题重复的，均由本书编者拟加或改拟加上，并将原有标题在题注中标出，以便查检，且注以“本书编者加的”字样。

四、选文文字，悉遵原有文字原貌。编者进行了校勘：对于原文中的明显错字径作了改正；对于有些当时使用的文字而今又无明显不当的，如“底”（的）、“那”（哪）；又如人名、地名，均一仍其旧；对于繁体字、异体字等均依国家颁行的规范字改正；对于疑为错字者，在原字后面用（ ）标出断为的正字。对于疑漏的字用〔 〕将疑漏字标出。

五、选文中对于节选的文字，均在题目末加上“节选”字样；对于文章进行必要删节的均用“略”字标出。

六、原著有标点的悉依原有标点，以保持文章的时代原貌；原有标点明显不当的，按文意或新式标点加以必要的校正。

七、关于使用版本。本书选文中，一般均采用首次发表的文字。有些文章在不同书刊先后发表，本书在选编时，选用编者认为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互校，均在脚注中注明，并在篇末注明不同版本的出处。

八、本书选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参考了王文俊、杨珣、郑致光、夏家善、梁吉生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其中部分选文的标题，为便于读者使用，本书采用了该书的标题，并在脚注中均用“题目是原编者加的”标明；此外，还部分地参考了该书的脚注文字；对此，本书编者表示感谢！

九、本书在编订过程中，得到了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重庆北碚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限于编者水平，本书在编订中会有许多不足或疏漏之处，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编者 1995年6月

# 目 录

## 1904 年

- 致严范孙…………… (1)

## 1905 年

- 敬告天津学界中同志诸君…………… (2)

## 1909 年

- 张伯苓先生自述信道之理由…………… (3)

## 1912 年

- 教育家之机会…………… (6)

## 1914 年

- 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 (8)

## 1915 年

- 诤诸生诚…………… (10)

- 同江苏体育代表团的谈话…………… (11)

- 自动…………… (12)

## 1916 年

- 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 (13)

- 舞台、学校和世界…………… (17)

- 怎样改正过错…………… (19)

- 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 (21)

- 南开学校中学部第八次毕业式训词…………… (24)

- 本学期之政策…………… (26)



- 欲强中国，端赖新少年 ..... (31)
- 拟向校风社社员演说大旨 ..... (34)
- 吾之救国药 ..... (35)
- 中国之第一要策在培养干才 ..... (38)

### 1917年

- 毕业班训词 ..... (40)
- 梁任公先生演说会开会词 ..... (42)
- 关于青春期卫生教育 ..... (44)
- 悼念张诗岑先生 ..... (46)
- 旧中国之新希望与旧南开之新责任 ..... (48)
- 南开学校满千人感言 ..... (51)
- 改造中国须去旧材料用新方法 ..... (52)
- 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归来演说 ..... (55)
- 留日南开同学欢迎会演说 ..... (58)

### 1918年

-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 ..... (61)

### 1919年

- 访美感想 ..... (64)
- 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 ..... (69)
- 教育宗旨当本国情而定 ..... (72)
- 在南开乐贤会上对学生家长的演说 ..... (76)
- 作事之方法 ..... (80)
- 本校教育政策 ..... (82)

### 1920年

- 要打算进步必须改组 ..... (84)
- 坚卓不拔，发展进取 ..... (86)